

# 成都地区宋代砖室墓的分期研究

吴 敬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摘要：成都地区宋代墓葬以砖室墓为主，它们形制独特且较有规律。本文收集了成都地区近年来公布的宋代砖室墓材料，从墓葬形制与随葬品方面入手，对其分期研究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成都地区；宋代砖室墓；墓葬形制；分期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4-0068-08

宋代成都府地处四川盆地西部，主要包括现在的成都市区及其附近市县。成都地区目前发现和报道的宋代墓葬以砖室墓为主，这些砖室墓的形制独特且较有规律，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相关的分期研究<sup>[1]</sup>，这一分期成果对该地区宋代墓葬的断代工作起了较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材料的不断增多，它已不能完全反映本地区宋代砖室墓的发展态势。本文全面收集了本地区报道的宋代砖室墓材料，拟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 一、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的类型学研究

### (一) 墓葬形制

本地区宋代砖室墓的数量较多<sup>[2]</sup>，根据墓葬的大小规模，可将其分为两型：

A型，大中型砖室墓，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长2米以上，宽多在1米以上，墓底铺砖，多为券顶。依据墓室结构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单室墓，依据墓室平面结构分四式：

式，平面呈梯形，或一半梯形、一半长方形，无壁龛，墓壁平直，墓底铺砖，形制较为简单，如博瑞M28(图一，1)、李家沱M1(图一，2)。

式，平面多为长方形，墓室空间比式更大，壁龛和肋拱的数量较少。如三圣乡M5、M6(图一，3、4)。

式，砖圻四角有不同程度的凹缺，多数在墓室两壁有数道肋拱，以此形成若干个竖龛，墓底铺砖或墓室后部砌棺床，棺床四周或三面留有

排水沟，墓底中央常有腰坑，墓室后壁多数也有1龛，如果两侧壁或后壁的龛是有意构建的，一般都为券顶龛或“凸”字形龛，如赵德成墓(图一，5)、博瑞M26(图一，6)。此外，新津邓双乡M1虽为石室墓，但是其形制与随葬品与这一时期的砖室墓接近，有肋拱及其所形成的壁龛，有后龛，只是整体形制没有砖室墓复杂。

式，平面形状规整，墓室的券顶、棺床与式相似，墓壁肋拱和壁龛数量比式相对要少，如官渠堰M5(图一，7)、博瑞M18(图一，8)。

Ab型，双室墓，即两个Aa型单室墓并列，有的在两室之间有过洞相通，分四式：

式，单室构造与Aa式相似，如保和乡M1、M2(图一，9)。

式，单室构造与Aa式相似，如青龙村M2(图一，10)。

式，单室构造与Aa式相似，如二仙桥M1(图一，11)。

式，单室构造更加简单，已不见壁龛，如化成M5(图一，12)。

B型，小型砖室墓，墓室长度多在1.5米以内，宽不到1米。目前发现的此类墓葬均有火葬迹象，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单室墓，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分三式：

式，墓室长、宽均在1-1.5米左右，墓室后部砌棺床，留有排水沟，有的有腰坑，墓室两壁有肋拱和壁龛，如青龙村M3(图一，13)。

式,墓室长1米左右,宽小于1米,墓室后部砌棺床,留有排水沟,有的有腰坑,墓室两壁及后壁有龕,但肋拱少见,如金鱼村 M3 (图一,14)、清江路 M10 (图一,15)。

式,墓室规模和构造基本与 式相同,但结构简化,无肋拱和壁龕,如博瑞 M27 (图一,16)、洪河大道 M7 (图一,17)。

Bb 型,双室墓,两个 Ba 型单室墓并列,分三式:

式,单室构造与 Ba 式相似,如博瑞 M12 (图一,18)。

式,单室构造与 Ba 式相似,如金鱼村 M9 (图一,19)。

式,单室构造与 Ba 式相似,如石墙村 M5 (图一,20)。

墓葬形制		Aa型	Ab型	Ba型	Bb型
第一 期	太祖——真宗	1 2			
	仁宗	3 4	9		
第二 期	英宗——钦宗	5 6	10	13	18
	高宗——孝宗	7 8	11	14 15	19
第三 期	光宗——卫王		12	16 17	20

图一

1—2.Aa 式(博瑞 M28、李家沱 M1) 3—4.Aa 式(三圣乡 M5、三圣乡 M6) 5—6.Aa 式(赵德成墓、博瑞 M26) 7—8.Aa 式(官渠壕 M5、博瑞 M18) 9.Ab 式(保和乡 M1、M2) 10.Ab 式(青龙村 M2) 11.Ab 式(二仙桥 M1) 12.Ab 式(化成 M5) 13.Ba 式(青龙村 M3) 14—15.Ba 式(金鱼村 M3、清江路 M10) 16—17.Ba 式(博瑞 M27、洪河大道 M7) 18.Bb 式(博瑞 M12) 19.Bb 式(金鱼村 M9) 20.Bb 式(石墙村 M5)

## (二) 随葬品

成都地区砖室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以釉瓷、俑和镇墓券最为常见,前两者具备了分期的条件,以下将主要对这两种随葬品的主要器型进行类型学研究。

1、釉瓷 从胎釉特征看多为邛窑系产品,器型主要有碗、盏、碟、罐。

碗 口径14厘米以上。标准分三型:

A 型,平底或平底略内凹,分两个亚型:

Aa 型,敞口,斜腹。标本博瑞 M28:4 (图二,1)。

Ab 型,敞口,深弧腹。标本青龙村 M2 左:14 (图二,2)。

B 型,圈足,弧腹,分两个亚型:

Ba 型,叠唇,分二式:

式,敞口,深弧腹。标本海滨村 M5:34 (图二,3)。

式,敞口外撇,斜弧腹。标本三圣乡 M7:19 (图二,4)。

Bb 型,圆唇,分三式:

式,口微敞,深弧腹。标本谢定夫妇墓出土 (图二,5)。

式,敞口,弧腹。标本青龙村 M3:2 (图二,6)。

式,口微撇,斜弧腹。标本二仙桥 M1:28 (图二,7)。

C 型,圈足,浅折腹。标本化成 M5 左:19 (图二,8)。

盏 口径12厘米以下,分两型:

A 型,敞口,圆唇,圈足,内底有纹饰,分二式:

式,矮圈足。标本十陵 M7:4 (图二,9)。

式,圈足增高。标本十陵 M3:5 (图二,10)。

B 型,敞口,圆唇,圈足较高,分二式:

式,圆弧腹。标本清江路 M7:4 (图二,11)。

式,斜腹。标本化成 M5 右:9 (图二,12)。

碟 口径与盏接近,腹较浅,平底,分两型:

A 型,敞口,厚唇,分二式:

式,厚方唇。标本十陵 M5:3 (图三,1)

式,厚唇减轻。标本石墙村 M5 右:8 (图三,2)。

B 型，敞口，圆唇，分二式：

式，浅弧腹。标本海滨村 M4：9(图三，3)。

式，斜腹。标本金鱼村 M9：11(图三，4)。

罐 这一地区出土釉瓷罐的器形较多，就主要器形而言可分为七型：

A 型，直口，短直颈，溜肩，弧腹，肩颈部有对称的四个竖耳。标本三圣乡 M5：1(图三，5)。

B 型，直口，鼓腹，平底或凹底，肩部有对称的两个横耳，分三式：

式，大鼓腹，器身较矮胖，器高和腹径比约 1/1(图三，6)。

式，微鼓腹，器高有所增加，器高和腹径比略大于 1/1，最大腹径位于器身偏上。标本海滨村 M1：4(图三，7)。

式，弧腹，瘦高，器高和腹径比接近 2/1，有的器身外表有白色划纹(图三，8)。

C 型，直口，腹微鼓，平底，腹部偏上有四个对称的竖耳，分二式：

式，直口，直颈微束，腹中部微鼓。标本青龙村 M2 左：2(图三，9)。

式，直口略敞、束颈、下腹微鼓。标本石岭村 M1：33(图三，10)。

D 型，小直口、广肩、大鼓腹、平底，肩部有对称的两个横耳，分二式：

式，最大腹径位于腹部偏上。标本海滨村 M4：7(图三，11)。

式，最大腹径位于腹部偏下。标本石岭村 M1：36(图三，12)。

E 型，直口，溜肩，鼓腹，平底或平底内凹，肩部有对称的两个横耳。标本三圣乡 M1 左：33(图三，13)。

F 型，敛口，肩部有对称的四个竖耳，其余形态同 E 型罐。标本青龙村 M2 左：12(图三，14)。

G 型，提梁罐，提梁呈蛙形，敛口，扁折腹，小平底，分二式：

式，蛙形提梁较为形象。标本博瑞 M12：5(图三，15)。

式，提梁呈简化的蛙形，腹部更扁。标本金鱼村 M9：8(图三，16)。

年代分期	器物类型	碗					盏	
		Aa型	Ab型	Ba型	Bb型	C型	A型	B型
第一期	太祖—真宗							
第二期	仁宗—钦宗	1	2	3	5		9	11
第三期	高宗—卫王			4	7	8	10	12

图二

1.Aa 型碗(博瑞 M28：4) 2.Ab 型碗(青龙村 M2 左：14) 3.Ba 式碗(海滨村 M5：34) 4.Ba 式碗(三圣乡 M7：19) 5.Bb 式碗(谢定夫妇墓) 6.Bb 式碗(青龙村 M3：2) 7.Bb 式碗(二仙桥 M1：28) 8.C 型碗(化成 M5 左：19) 9.B 式盏(十陵 M7：4) 10.B 式盏(十陵 M3：5) 11.C 式盏(清江路 M7：4) 12.C 式盏(化成 M5 右：9)

年代分期	器物类型	碟		罐						
		A型	B型	A型	B型	C型	D型	E型	F型	G型
第一期	太祖—真宗				6					
第二期	早段—仁宗	1		5						
第二期	晚段—英宗—钦宗		3		7	9	11	13	14	15
第三期	高宗—卫王	2	4	8	10	12				16

图三

1.AI 式碟(十陵 M5：3) 2.AII 式碟(石墙村 M5 右：8) 3.BI 式碟(海滨村 M4：9) 4.BII 式碟(金鱼村 M9：11) 5.A 型罐(三圣乡 M5：1) 6.BI 式罐(李家沱 M1：2) 7.BII 式罐(海滨村 M1：4) 8.BIII 式罐(石墙村 M5 右：10) 9.CI 式罐(青龙村 M2 左：2) 10.CII 式罐(石岭村 M1：33) 11.DI 式罐(海滨村 M4：7) 12.DII 式罐(石岭村 M1：36) 13.E 型罐(三圣乡 M1 左：33) 14.F 型罐(青龙村 M2 左：12) 15.GI 式罐(博瑞 M12：5) 16.GII 式罐(金鱼村 M9：8)

## 2、俑 本区宋墓出土的俑种类繁多，

有釉陶俑和三彩俑，每墓多者数十件，少者几件，本文将对俑的主要类型进行类型学研究。

文俑 头戴冠、幞头或风帽，身穿圆领广袖长袍或右衽广袖长袍的站立男子，长袍垂地，略微露出足尖。根据手中姿势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 型，双手交于胸前，手中执笏，手中木笏有的已经腐烂而为中空状态，分三式：

式，制作较为精细，面部表情逼真，背部衣着平齐，下裙外撇呈“风”字形。标本保和乡 M1：17(图四，1)

式，形制与 式接近，背部衣着丰满，下裙直筒形。标本三圣乡 M1 左：50(图四，2)。

式，制作粗糙，面部表情呆板，下裙直筒形。标本二仙桥 M1：56(图四，3)。

B 型，双手交握于胸前，左手握住右手



上部或全部,头戴平顶冠或幞头,下裙呈直筒形,分二式:

式,制作精致,面部表情逼真。标本新津邓双乡 M1 西:8 (图四,4)。

式,制作粗糙,面部表情较为呆板。标本石墙村 M5 左:5 (图四,5)。

C型,双臂横放交于胸前,长袍的广袖将手部完全遮住,头戴进贤冠,或幞头,或风帽,分二式:

式,制作细致,面部表情逼真。标本海滨村 M5:22 (图四,6)。

式,制作粗糙,面部表情较为呆板。标本石墙村 M5 右:16 (图四,7)。

武俑 头戴兜鍪或风帽、身穿铠甲、站立于座上的武士,均成对出土,分三式:

式 式,头戴兜鍪,护耳上卷,盔顶上有尖状缨饰,内穿落地长襦,外套是由项铠、短甲、披膊甲、护肘、腿裙组合而成的铠甲,铠甲呈密集的鱼鳞状排列,腹部围有多种样式的抱肚,并束革带,刻画细致,背部衣着平齐,面部表情威严,双手交于腹部,腿裙几乎能覆盖下半

身大部分。标本保和乡 M1:1 (图四,8)。

式,装束与刻画多与 式相似,无披膊甲,背部衣着丰满,铠甲为长方形细条状甲片密集排列。标本三圣乡 M1 左:44 (图四,9)。

式,头戴的兜鍪,但较 式简略,无护耳或护耳无上卷,出现了头戴风帽的造型,内穿落地长襦,领口多呈“V”字形,外套是仅由短甲和腿裙组成的铠甲,甲片都为稀疏的鱼鳞状,胸前短甲多为方形,双手全部交握于腹部,抱肚形式单一,腿裙短窄仅至膝盖,表情呆板,身体臃肿。标本石岭村 M1:37 (图四,10)。

男侍俑 男子头戴幞头或裹巾帻,身穿圆领窄袖长服或紧袖长服,腰束带,有的将长服卷起来束于腰部,或叉手而立,或为劳作状,分三式:

式,制作较为精细,面部表情逼真,背部衣着平齐,下裙外撇呈“风”字形。标本三圣乡 M5:10 (图四,11)。

式,与 式接近,背部衣着丰满,下裙呈直筒形。标本新津邓双乡 M1 西:25 (图四,12)。

式,制作粗糙,面部表情较为呆板,下裙呈直筒形。标本二仙桥 M1:48 (图四,13)。

女侍俑 女子呈站立状,头扎单髻、双髻或盘髻,身穿圆领窄袖落地长服,或右衽窄袖落地长服,双手交叉于胸前或腹部,分三式:

式,发髻和衣着刻画细致,头部低矮前倾,背部衣着平齐,下裙外撇呈“风”字形。标本保和乡 M2:14 (图四,14)。

式,表情刻画细致,背部衣着丰满,下裙微外撇。标本海滨村 M5:31 (图四,15)。

式,发髻和衣着刻划较简略,下裙直筒形。标本二仙桥 M1:63 (图四,16)。

鸡俑 分三式:

式,蹲坐状,羽毛刻画栩栩如生。标本保和乡 M1:34 (图四,17)。

式,站立状,刻画细致程度与 式相似。标本三圣乡 M1 左:3 (图四,18)。

式,面部、鸡冠和羽毛的刻画都较为呆板,线条稀疏。标本三圣乡 M7:18 (图四,19)。

狗俑 分三式:

年代分期	器物类型	文 俑			武 俑	男侍俑	女侍俑	鸡 俑	狗 俑
		A型	B型	C型					
第一期	太祖—真宗								
第二期	早段	仁宗							
	晚段	英宗—钦宗							
第三期	高宗—卫王								

图 四

1.A 式文俑 (保和乡 M1:17) 2.A 式文俑 (三圣乡 M1 左:50) 3.A 式文俑 (二仙桥 M1:56) 4.B 式文俑 (新津邓双乡 M1 西:8) 5.B 式文俑 (石墙村 M5 左:5) 6.C 式文俑 (海滨村 M5:22) 7.C 式文俑 (石墙村 M5 右:16) 8. 式武俑 (保和乡 M1:1) 9. 式武俑 (三圣乡 M1 左:44) 10. 式武俑 (石岭村 M1:37) 11. 式男侍俑 (三圣乡 M5:10) 12. 式男侍俑 (新津邓双乡 M1 西:25) 13. 式男侍俑 (二仙桥 M1:48) 14. 式女侍俑 (保和乡 M2:14) 15. 式女侍俑 (石岭村 M5:31) 16. 式女侍俑 (二仙桥 M1:63) 17. 式鸡俑 (保和乡 M1:34) 18. 式鸡俑 (三圣乡 M1 左:3) 19. 式鸡俑 (三圣乡 M7:18) 20. 式狗俑 (保和乡 M1:43) 21. 式狗俑 (广汉雒城 M1:21) 22. 式狗俑 (化成 M5 左:11)

式，匍匐状，刻画生动。标本保和乡 M1：43（图四，20）。

式，匍匐状或蹲坐状，刻画细致程度与式相似。标本广汉雒城 M1：21（图四，21）。

式，刻画呆板，线条稀疏。标本化成 M5左：11（图四，22）。

匍匐俑 面部为女子造型，身体匍匐于地，抬头向前观望，分三式：

式，衣着、发髻和表情刻画细致，目光有神，体形较胖。标本保和乡 M1：7（图五，1）。

式，形制与式相似，体形较瘦，头部抬起。标本新津邓双乡 M1西：26（图五，2）。

式，头部更加抬起，面部制作粗糙，服饰刻划简单。标本二仙桥 M1：40（图五，3）。

人面蛇身俑 两条缠绕在一起的蛇身两头各有一个面造型，分二式：

式，表情刻画细致，颈部较短，可辨男女。标本张确夫妇墓出土（图五，4）

式，颈部较长，面部刻划不能分辨性别。

标本二仙桥 M1：31（图五，5）。

猪面俑 脸部为猪面，衣着和文俑相似，分二式：

式，面部刻画细致，猪面的耳朵与人耳近似。标本新津邓双乡 M1西：11（图五，6）。

式，制作粗糙，面部表情较为呆板，耳朵下垂较长。标本石岭村 M1：23（图五，7）。

仰观俑 衣着与文吏俑相似，呈侧耳仰头状，分三式：

式，站立状，背部衣着平齐，表情刻画细致，下裙外撇呈“风”字形。标本保和乡 M2：26（图五，8）。

式，坐状，双手交于胸前，刻画细致程度与式相似。标本新津邓双乡 M1西：16（图五，9）。

式，坐状，头部较式侧倾加重，面部刻划简略。标本双流华阳 M10西：3（图五，10）。

伏听俑 衣着与文吏俑相似，呈侧耳匍匐状，面朝侧方，分三式：

式，体形较胖，头部侧倾略微抬起，表情刻画生动。标本保和乡 M1：31（图五，11）。

式，体形偏瘦，头部侧倾呈45度，刻画细致程度与式相似。标本三圣乡 M1左：47（图五，12）。

式，头部侧倾近直，表情刻画呆板。标本二仙桥 M1：25（图五，13）。
















鼓俑 蹄状座，座上安置一面圆形鼓，分二式：

式，鼓侧面都有两排鼓钉。标本三圣乡 M1左：38（图五，14）。

式，鼓侧面无鼓钉，有的在鼓座上刻划纹饰。标本二仙桥 M1：58（图五，15）。

兽面足 五趾蹄状座上安置了一个兽面，分二式：

式，兽足面部的眉毛、眼珠、牙齿、下颏和须的刻画精细、生动。标本三圣乡 M1左：39（图五，16）。

年代分期	器物类型	匍匐俑	人面蛇身俑	猪面俑	仰观俑	伏听俑	鼓俑	兽面足
第一期	太祖——真宗							
第二段	仁宗							
第二段	英宗——钦宗							
第三期	高宗——卫王							

图五

1. 式匍匐俑（保和乡 M1：7） 2. 式匍匐俑（新津邓双乡 M1西：26） 3. 式匍匐俑（二仙桥 M1：40） 4. 式人面蛇身俑（张确夫妇墓） 5. 式人面蛇身俑（二仙桥 M1：31） 6. 式猪面俑（新津邓双乡 M1西：11） 7. 式猪面俑（石岭村 M1：23） 8. 式仰观俑（保和乡 M2：26） 9. 式仰观俑（新津邓双乡 M1西：16） 10. 式仰观俑（双流华阳 M10西：3） 11. 式伏听俑（保和乡 M1：31） 12. 式伏听俑（三圣乡 M1左：47） 13. 式伏听俑（二仙桥 M1：25） 14. 式鼓俑（三圣乡 M1左：38） 15. 式鼓俑（二仙桥 M1：58） 16. 式兽面足（三圣乡 M1左：39） 17. 式兽面足（化成 M5左：5）

式,兽面刻画要比式简略。标本化成M5左:5(图五,17)。

除釉瓷和俑以外,本地区还随葬有大量的镇墓券,根据券文文字的不同,主要有“华盖宫”文券、“天帝敕告”文券以及“安(镇)墓真文”、“消灾真文”、“炼度真文”等各类真文券。这些镇墓券的形制相近,本文在此不再详细介绍。

## 二、分期及各期主要特征

本地区报道的宋代砖室中,有的墓葬中出土了墓志或地券,记载了该墓的下葬年代,根据对纪年墓的综合分析,并结合其它特征明显的无纪年墓葬的材料,大致可以将本地区的宋代墓葬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北宋太祖—真宗时期,基本不见纪年墓,代表墓葬有博瑞M28、李家沱M1、十陵M5等。这一时期墓葬形制较为简单,根据博瑞M28出土的淳化元宝以及该墓与本地区唐末五代小型砖室墓的近似程度来看<sup>[3]</sup>,这种平面呈梯形的Aa式砖室墓为北宋早期的可能性较大。随葬品中仅有少量的A型碗、A式碟以及B式罐,且基本不见俑和镇墓券。

第二期:北宋仁宗—钦宗时期。本期可分为两段:

早段为仁宗时期,可见少量纪年墓,代表墓葬有三圣乡M5、三圣乡M6(1056年)以及保和乡M1、M2等。此时A型砖室墓的墓室空间开始增大,壁龛较少,Ab型砖室墓即为两个Aa型砖室墓并列。这一时期开始,墓葬中开始出现随葬俑的现象,就俑的个体造型而言,此时的俑背部多较为平齐。这一时期的各类俑中,A型文俑在各型文俑中出土数量相对较多,而且此时各类俑的刻划均十分细致,面部表情丰富。

晚段为英宗—钦宗时期,纪年墓发现数量较多,代表墓葬有青龙村M2(1062年)<sup>[4]</sup>、赵德成墓(1081年)、谢定夫妇墓(左室1085年、右室1093年)、张确夫妇墓(1093年)、广汉雒城M1(元祐年间)、青龙村M3(1106年)、海滨村M1(1099年)、M4(1095年)、M5(1094年)、博瑞M26(1121年)、三圣乡M1(1126年)等。此时墓室不仅空间增大,墓室四角多为凹凸对称,而且墓室侧壁、后壁建造了大量的壁龛,壁龛间形成了肋柱,并且出现了仿造A型砖室墓但空间

减小的B型砖石火葬墓。这一时期的随葬品也大量丰富,釉瓷碗多为圈足,罐的种类大大增加。此时,墓葬中随葬俑的现象较为普遍,俑的背部均较为丰满,而且刻划也十分细致。

除了釉瓷和俑以外,第二期的墓葬中出现了随葬镇墓券的现象,而且数量众多。“华盖宫”文券、“天帝敕告”文券共存的现象相对较多,如保和乡M1(北宋中期早段)、青龙村M6(北宋中期)、华阳三圣乡上河村M2(1069年)、张确夫妇墓(1093)等。随葬真文券的现象相对较少,仅见谢定夫妇墓左室(1085)。三类镇墓券共存的现象相对较少,目前可以确定的有青龙村M2左室(1062年)、谢定夫妇墓右室(1093年)。

第三期:南宋时期。本阶段可分为两段:早段为高宗—孝宗时期,代表墓葬有二仙桥M1(1152年)、官渠埝M5(1158年)、博瑞M18(1163年)、金鱼村M3(1182年)、M9(1182年)等。此时Aa型砖室墓的墓圻规整,墓室内壁龛减少、变小,Ab型砖室墓的单室与此时的Aa型砖室墓相似。

晚段为光宗—南宋灭亡,代表墓葬有石墙村M5(左室1192年、右室1211年)、化成M5(1235年)、博瑞M27、洪河大道M7等。此时Ab型砖室墓的建造更为简单,壁龛已基本消失。B型砖室墓的演变特点与Ab型砖室墓相似,均呈简化趋势。

这一时期釉瓷器型的演变并不明显,而各种造型俑的变化与第二期相比十分突出。各类俑刻划粗糙、表情呆板、线条稀疏,C型文俑在各型文俑中出土数量相对较多,A型文俑出土数量大大减少,匍匐俑和伏听俑的抬头趋势较为明显。

北宋末年至南宋时期,“华盖宫”文券、“天帝敕告”文券和真文券共存的现象出现较多,如甘油村M1(1124年)、宋京墓(1124年)、三圣乡M1左室(1126年)、紫荆路M3(北宋晚期)、跳蹬河王宜人墓(1132年)、二仙桥M1(1152年)、石羊工业园M1东室(南宋时期)等。但是,不共存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数量相对较少,如宋京之妻蒲氏墓(1151年)、石岭村M1(1213年)仅随葬了真文券,而随葬“华盖宫”文券和“天帝敕告”文券的墓葬较少。



### 三、社会背景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期,可以从墓葬形制中看出其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发展过程,俑的造型也体现了由复杂到简化的过程,这一趋势可能与宋代成都府路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道教因素有着一定的联系。

#### (一) 经济背景

五代十国时期成都地区是前、后蜀政权的腹心地区,此时的墓葬可见多室、多龕的大型砖(石)室墓和小型砖室墓,其中许多大型墓葬砌有仿木结构建筑。北宋乾德元年(965年)平定后蜀政权,对该地区实行的政策失调<sup>[5]</sup>,先后导致了全师雄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和王均兵变等。从平定后蜀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年底王均兵变被平息的三十年多间,四川地区的社会形势长期没有稳定。因此北宋真宗以前的四川地区,社会比较动荡、经济比较衰败。因此,北宋初期成都府路的多数百姓没有实力去营造前、后蜀时期那样较为奢华的墓葬,那些大型墓葬流传至北宋初期的可能性也就很小。所以,本地区北宋初期的Aa式砖室墓主要是继承了唐末五代小型砖室墓的风格<sup>[6]</sup>,而且政局的动荡也可能导致纪年墓的罕见。

平定后蜀政权后,北宋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扶持政策<sup>[7]</sup>,加之本地区经济底蕴深厚,因此随着真宗时期动乱的平息,经济发展逐渐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哲宗至徽宗时期,社会安定,生产、生活都呈良好状态<sup>[8]</sup>。第二期砖室墓中,早段A型砖室墓的构造还较为简单,晚段A型砖室墓十分复杂。而且,神宗时期开始,纪年墓数量大大增多。虽然不能以发现数量作为判断的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阶段整体上与北宋初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发展,随葬品也更为丰厚了。这可能导致少数贫民开始使用Ba式、Bb式火葬墓,这种丧葬形式较为节省,且墓葬中的随葬品也较少,这其中可能也包括了一些佛教信徒。

南宋初期,四川地区成为抗金前线,战场的胜利以及“绍兴和议(1141年)”、“隆兴和议(1164年)”的签订使四川地区未受战争的摧残,但浩大的军费供给对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同时,不断加重的赋税也给本地区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sup>[9]</sup>,其经济状况已不能与北宋中后期相

比。南宋前期,Aa式、Ab式砖室墓比北宋中后期Aa式、Ab式简化,火葬墓增多,且形制也比北宋晚期简化。其次,从陶俑所具有的共同发展趋势来看,北宋制作精致,南宋制作粗略,这种变化可能与服饰本身变化的关系不大,而是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制作工艺简化。南宋中期以后,宋金战火重燃,短暂的和平又被打破。蒙古灭金后,马上开始进攻南宋,四川地区首当其冲。从端平二年(1235年)到南宋灭亡,宋蒙之间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蒙古军队常攻入四川内地劫掠而回。战乱的频繁导致南宋后期本地区社会动荡、户口锐减、经济残破<sup>[10]</sup>,这可能也是Ab式砖室墓比Ab式更为简化的原因之一。同时,社会底层的人可能更多地选择火葬,而且就火葬墓的形制而言,Ba式、Bb式也比南宋前期的Ba式、Bb式更为简单。

#### (二) 道教因素

成都地区宋代墓葬中道教因素十分浓厚,俑、镇墓券都是道教文化的代表,这种现象可能与道教圣地青城山在本地区的影响有较大关系。东汉时期,张道陵来到青城山,创立了“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属正一派,青城山遂成为道教的发祥地,被列为道教“第五洞天”。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来青城山,天师道传统与上清道结合。北宋中期以后道教因素在墓葬中的流行可能与北宋时期道教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而北宋诸帝中又以真宗和徽宗尤甚。宋真宗时“(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并以‘天庆’为额,民有愿舍地备材创盖者亦听。先是,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sup>[11]</sup>。本地区俑大量流行于北宋中期以后,而且从年代较早的保和乡M1来看,俑与“华盖宫”文券、“天帝敕告”文券共出,它们应大致是同一时期出现的。

“华盖宫”文券和“天帝敕告”文券属于道教上清派,“安(镇)墓真文”券、“消灾真文”券和“炼度真文”券属于道教灵宝派<sup>[12]</sup>。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可定为北宋初期的镇墓券,北宋中期至徽宗以前,多为一派镇墓券出土于一墓,且上清派的“华盖宫”文券和“天帝敕告”文券出土相对较多,灵宝派的“真文券”相对较少。可见,这一时期本地上清派势力可能较灵宝

派更大。从徽宗以前两派镇墓券共存的现象相对较少来看,虽然上清派与灵宝派对丧葬的信仰已有了融合的趋势,但是两派仍表现得较为独立。

宋徽宗时期,天下崇道之风到达了一个顶峰,此时的文献记载,“林灵素既主张道教而废释氏。政和中,诏每州置神霄宫,就以道观为之,或改所在名刹,揭立扁榜”<sup>[13]</sup>,“(政和七年)皇帝崇尚道教,号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辛未,改天下天宁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无观者以寺充”<sup>[14]</sup>。正是从徽宗末年至南宋时期,两派镇墓券共存的现象增多,可能是徽宗时期所掀起的崇道之风在北宋末期使本地区道教信仰在民间葬俗的选择上产生了合流。但是,两派镇墓券不共存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此时灵宝派势力的发展已超过了本地的上清派,因此这一时期随葬一派镇墓券的多是灵宝派“真文券”。

综上所述,成都地区宋代砖室墓的发展过程与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着一定的联系,而且道教因素对墓葬的影响也是随着宋代两次崇道高峰逐渐波及和扩大的,这也从丧葬方面反映了成都地区宋代社会的发展情况。

注释:

[1] 陈云洪:《试论四川宋墓》,《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2] 本文所用材料较多,为避免重复注释,以下将本文引用的材料统一介绍:傅汉良:《成都外东跳蹬河发现宋代墓葬》,《考古通讯》1956年6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官渠埡唐、宋、明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华阳北宋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2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广汉县雒城镇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0年2期;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文物》1990年第3期;刘骏:《成都东郊北宋谢定夫妇墓清理简报》,《成都文物》1995年第2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成都市西郊金鱼村南宋砖室火葬墓》,《考古》1997年第10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北郊甘柏村发现北宋宣和六年墓》,《四川文物》1999年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石羊乡新加坡工业园区宋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1999年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李家沱唐宋时期墓葬》,《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王方:《成都市南郊北宋赵德成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01年第3期;冯先成等:《成都市外化成小区南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王方等:《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唐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王仲雄等:《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朱章义等:《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张擎:《成都市高新区石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魏绍笛等:《成都西郊清江路唐

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刘雨茂等:《成都博瑞“都市花园”汉、宋墓葬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成华区三圣乡花果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大道南延线唐宋墓葬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保和乡东桂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津县邓双乡北宋石室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市双流县华阳镇绿水康城小区发现一批砖室墓》,《成都考古发现》(2003),科学出版社200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龙乡海滨村墓葬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3),科学出版社200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龙乡石岭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3),科学出版社2005年。

[3][6] 刘雨茂等:《四川地区唐代砖室墓分期研究初论》,《四川文物》1999年3期。

[4] 此墓属于仁宗末年,1063年4月英宗便即位,因此将其归入第二期晚段。

[5] (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卷一七《削平僭伪》,曰:“先是国家平孟氏之乱,成都府库之物,悉载归于内府。后来任事者竞功利,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群众起而为乱”,《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载周光培主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之《宋代笔记小说(第十一册)》70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7] (宋)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第一,曰:“蜀初平,吕馀庆出守,太祖谕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榷税食饮之物,皆宜罢。’馀庆奉诏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复思故主矣”,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17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4478页,曰:“(至道、天禧年间)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出其境”,中华书局1985年。

[8]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282—28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9] (明)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六《周南对策》,曰:“及渡江以后,则四蜀之赋,增三数十倍”,据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永乐本重印,载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801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

[10] 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262—27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11]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二《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637页,中华书局1980年。

[12] 张勋燎:《川西宋墓和陕西、河南唐墓出土镇墓文石刻之研究——道教考古专题研究之三》,《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3] (宋)洪迈撰:《夷坚志·夷坚三志己》卷第九《泗州普照像》1369页,中华书局1981年。

[14] (宋)王称撰:《东都事略》第十一卷《徽宗皇帝二》,载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219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